

基督新教比天主教更有經濟優勢？

韋伯在 1904/05 年，提出一個高議論性的論點：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區，與近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域，有密切的重疊。引起學界爭辯的議題是：基督新教的教義，與經濟增長這兩件事，是歷史上的巧合（相關）？還是有因果關係（新教精神帶動積極追求經濟成就的動機，因而促進資本主義發達）？學界百年來對這個議題投入過多資源，現在依據足夠的證據，該做個總結了。

本文有三條主軸：(1)整理主要的學說論點。(2)舉史例說明，爭辯宗教與經濟發展這個命題，是邏輯上「不相關之謬證」(fallacy of irrelevant proof)。(3)提出統計分析的證據，反駁韋伯學說。

問：可否用老少皆宜的方式，綜述學界主要論點？

答：(1) 1551 年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，催生了基督新教，也改變對世俗利益的態度，鼓勵新教徒追求經濟成就來榮耀主。原本地位較低的商人與工匠，改變天主教義的心態，不再認為勞動是對罪惡的懲罰 (work as a punishment for sin)，也不再認為辛勤的勞工，是低人一等的行業。新教鼓勵信眾祈禱，直接與神溝通，不再相信宿命說、奇蹟論，因而刺激理性主義的發展。這種理性心態，對追求經濟成就與累積資本，產生長期的推動性助益。

(2)這種新教精神，改變了世界觀與作為方式，信眾更勤奮工作，節儉累積。這隱含一個可檢驗的假說：19 世紀產業革命的成功，是新教精神在 16-18 世紀，已為工作態度與資金累積做好到位準備。所以產業革命的地區，與信仰新教的區域，地理上有高度重疊性。這個論點成立嗎？是表面相關，還是有內在因果？

(3)反過來說，信仰天主教的地區，信眾追求內心平衡，認為睡得好比吃得好重要，認為追求財富人的想上天堂，會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。所以天主教地區，很難有積

極的工作倫理，因為眼界與活動範圍，太受宗教觀的限制。神權的牽制太強，不易產生理性主義與科學態度。也不積極向海外發展，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與產業革命。信仰回教的地區，也有類似的局限。所以新教精神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進器。

問：這三點綜述得很明確，韋伯當初就這麼清晰嗎？

答：當然不是。所有的原創者，在摸索過程必然是模糊的，甚至常會自我矛盾。這些現象，在馬克思和凱恩斯身上都常見，「原創的模糊性」是學界常態。日後的學者加油添醋，各自投射，日久之後得出共識，稱為共識（common interpretation）。所謂的共識，是學界長久爭辯，「語意膨脹」之後的醞釀結果。所以前述三點，已不是韋伯原意，而是「韋伯式」的論點，正如馬克思不願承認，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。

問：為什麼「韋伯臆測」會成為風行世界的學說？

答：韋伯命題已多次變身，各國學者自擁異說，讓人看得眼花撩亂。我認為這個命題的現況，迷思（myth，傳說得太神奇）的成份，遠超過科學假說的本份。在諸多原因中，美國學界扮演重要角色。韋伯這本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1958年由哈佛著名社會學者 Talcott Parsons 英譯，風靡英語學界。透過英譯本轉譯各國譯本，產生「多手傳播」的諸多插曲。

(1)語意上的扭曲：Parsons 的譯本與德文原著，已有微妙扭曲。各國譯本在英譯的基礎，發揮「多重複印」的失真傳遞效果。如果韋伯棺中復起，且能讀懂各國譯本，他必然搖頭不語。

(2)潛意識的「託譯言志」：19世紀末葉美國經濟迅速起飛，除了地大物博、地廣人稀、資源充沛這些外在因素，文史學者一直想證明，清教徒與新教徒的信仰，對工作倫理也有積極的貢獻。為了證明精神上的優勢，曾引入「社會達爾文主義」，想證明資本主義的興盛，就是「優勝劣敗、適者生存」學說的具體表現：鼓勵競爭、汰除劣者，才能讓經濟更繁盛。

社會達爾文主義隱含歧視偏見，因而逐漸褪色，中性的韋伯學說繼而代之：新教的宗教觀，有助於建立工作倫理、產業革命、資本主義發展。美國的強盛是根植於宗教上的激勵，只要努力都有機會實現「美國夢」。二次大戰後各國的留美學界，也跟著「搖韋伯旗」，把新教倫理說推到「準聖物」（quasi-sacred）的地位。韋伯的著作與傳記風行於世，好幾代的社會學者深陷其中。在這股跟風下，各國學者也急著檢驗，本

國史實是否符合韋伯論點。

問：結果是「愈辯愈明」，還是「愈說愈糊塗」？

答：若是前者，就不需要在此耗費筆墨。關鍵點之一，在於過度一般化：新教信仰區，確實出現過受人尊崇的發明者、企業家。過度推廣韋伯學說，讓人誤以為在新教地區，人人都深具企業家精神，個個都勤奮節儉。其實在全世界人口中，聖賢才智平庸愚劣是常態分佈。如果你要找重要科學家、發現者、企業家，任何宗教區都有，這和宗教精神沒因果。不能把「19世紀的產業革命」和「16-18世紀的新教信仰地區」，這兩個「並列因素」，自動轉換為「因果關係」。

問：我常看到有人論證：儒家思想和新教倫理類似，鼓勵節儉勤奮，所以能解釋二次戰後台灣的迅速成長。

答：戰後亞洲幾個新興工業國家，正好是儒家文化被及之處，經濟發展與儒家文化的關係，就被串連起來。我直覺想問：淵源流長的儒家文化，若能解釋戰後亞洲的快速成長，那麼又怎麼解釋1945年之前，亞洲地區長期普遍的落後？怎能用形而上的因素，去解釋激烈競爭、無情淘汰的經濟現象？經濟因素或甚至地理條件才是關鍵。

你會反問：以中國為例，歷代政府權力與控制力甚強，商人不能像在歐洲一樣，有較大的發展自由度。我舉個反論：假如新大陸是中國人發現的，亞、非、拉丁美洲的殖民地，也由中國政府拓殖，工業革命也發生在中國。就算中國仍是君主集權，法家思想是主流，這些文化因素的決定力，絕對比不上工業革命、新大陸、殖民地之中的任何一項。

18-19世紀西方的發達，是殖民地市場的開拓，創造了資本主義；而不是資本主義，創造了殖民地的開拓。把時間倒退千年來看，西班牙在地中海區曾是強者，阿拉伯人在東西貿易上也強盛過。後來他們沒落了，但他們的宗教與文化，仍嚴格地保留下來。如果宗教文化能解釋，阿拉伯與西班牙的強勢，那又怎麼說明它們的衰落？答案還是要在經濟、地理因素裡找尋。

舉個近代的例子。比利時北部荷語區，是荷蘭人種與文化，但宗教是天主教。南部是法國人種與文化（以天主教為主），東面有小部分是德國人種與文化（以基督新教為主）。所以在人種文化上，比利時是個三元國家，各有獨自的系統。二次大戰前

比利時的荷語區，文化與經濟相對落後，法語區有凌人的優越感，煤礦與鋼鐵業也集中在法語區。

戰後法語區的礦業沒落了，鋼鐵業被日本、美國取代了，荷語區有了新工業，如汽車裝配、化工業、安特衛普港的大量吞吐。荷語區的勢力因而興起，政治權力向北轉移。在這個例子裡，文化與宗教因素發揮哪些作用？再以臺灣為例，戰後的快速成長，若非國際市場開拓成功，不管有什麼文化精神，都是不濟事的。在宗教與成長之間建構關係，那是邏輯上「不相關之謬證」（fallacy of irrelevant proof）。

問：有人套用韋伯說法，認為中國無自發性的資本主義或現代化成長，是因為沒有類似新教倫理中的企業精神。儒家的思維方式、對財富的觀念，阻礙了現代化。

答：1960-70 年代日本的經濟成就，給這種說法提出反例：儒家不是個絆腳石，它可以是催化劑。這個論點在 1970 年代，很受到知識界的擁護，因為亞洲四條小龍，正好是儒家文化被及之地，就認為儒家思想有助成長。有興趣的人可以試做個表格，以中國的各朝代為縱軸，以儒家、法家、道家等文化與制度為橫軸，在畫出的格子內，填出某朝代是在哪種文化思想下，其經濟成就如何。這樣就可以觀察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，文化因素與經濟成果的相關度。

文史學者談論經濟現象時，要「形而下」一些，尤其要避免文化迷信。把經濟強盛和文化、宗教因素連在一起，在人類演進史上相當牽強。西洋的經濟重心，從希臘（愛琴海）逐漸移轉到威尼斯（地中海），再轉到西班牙、葡萄牙（南大西洋），再轉到西歐（北海），目前在北美（北大西洋）。以長期眼光來看，各時期各地區的強盛，和信奉某種宗教的關係甚小。

地理與經濟力量才是關鍵，例如威尼斯在貿易上的重要位置、西班牙發現新大陸與殖民中南美、英法的海外殖民與掠奪。這幾個經濟重心，都已成為歷史名詞，但其文化仍各自嚴格保留下來。英國從日不落國到今日的衰退，新教倫理又能解釋什麼？

問：經濟學家有精確的統計分析，支持或反駁韋伯學說嗎？

答：社會學界也做過統計分析，基本上不支持韋伯論點，曲型的代表作，是文末參考書目的 Delacroix and Nielsen (2001)。這篇長文做了很好的理論綜述，也對歐洲諸國在 19 世紀的狀況，做了統計分析，得到以下結論。信仰基督新教的人口比例，和下列因素無預期的關係（也就是統計上不顯著相關）：平均每人的財富、證券交易所的

成立時間、1870 年代的鐵路網密度、1850 年代的嬰兒死亡率、農業的男性勞動力、工業的男性勞動力。

換言之，19 世紀的歐洲各國，信仰新教與否，與平均所得、金融市場的建立，這些重要經濟因素，並無統計的顯著關係，因而明確反駁韋伯論點。如果鐵路網是發展的重要指標，1900 年代的證據是：新教區的鐵路網，系統性地比天主教區落後，這與韋伯論點完全牴觸。

慕尼黑大學的經濟史學者 Cantoni，對德國地區的基督新教，發表過幾篇重要論文。他在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的 *Economic Journal*，發表過一篇 16 世紀德國基督新教的論文“Adopting a New Religion”（2012），以下介紹他的新近計量分析（參見文末書目）。

他的研究期間長達 6 百年（1300-1900），樣本地區很遼闊（神聖羅馬帝國）的 272 個城市。為何有意義？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內的宗教，非均質性很高（教派多元）。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確：基督新教與經濟發展無關（no effects）、與樣本的大小或挑選偏差無關（表示這是普遍現象）、與生育率、識字率無關。結論是：宗教信仰是文化因素，在廣闊的神聖羅馬帝國地區，6 百年的資料完全否定韋伯命題。

問：這樣的摘述太簡短武斷，願聞其詳。

答：先說資料的可信度。這是屬於「大自然實驗室」的資料：(1)神聖羅馬帝國疆域內，各種宗教多元存在，最方便對比教義差別與經濟成長的因果。(2)城市的樣本數很大（=272），長期人口統計數字可靠。(3)各城市的宗教特性（屬於天主教或新教），在 16-19 世紀間很穩定。

根據「趨同演化」原理，你必然質疑，帝國內的城市發展水平，長時期之後會走向均一化。也就是說，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城市的成長，不容易用肉眼觀察出顯著差異。必須用複雜的統計檢定，判別諸多經濟因素的變動度，與該城市的新教人口比例，是否有顯著意義。

檢驗的過程，需要複雜的大量運算，表格圖型也多到難以綜述。學界對這種長期資料的迴歸分析，有一種共識性的說法：有兩件事只要知道結果，不要詳知過程（製做香腸與統計迴歸）。

Cantoni 指出：韋伯的著名學說，很少用長期的歷史資料檢驗。現在他用 1300-1900 的統計，分析教派分布長期穩定的區域（主要在今日德國地區，見他的頁 573 地圖）。

這 272 個城市的樣本，提供各種長期變數證據，透過複雜的統計檢定，得到明確的負面答案（韋伯命題不成立）：天主教區的經濟成長，未必居於劣勢，基督新教區的經濟優勢說，恐怕是缺乏史實的誤解。

參考書目

- Cantoni, Davide (2015): “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: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”, *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*, 13(4):561-98.
- Delacroix, Jacques and François Nielsen (2001): “The beloved myth: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”, *Social Forces*, 80(2):509-53.